



海棠文丛

第一辑

胡益民 著

张岱研究

安徽教育出版社

海
棠
文
丛

胡益民 著

张岱研究

第一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岱研究/胡益民著.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5

(海棠文丛. 第1辑)

ISBN 7-5336-2966-3

I. 张... II. 胡... III. 张岱(1597~1679)—人
物研究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29678 号

责任编辑:万直纯

装帧设计:黄彦

出版发行:安徽教育出版社(合肥市跃进路1号)

网 址:<http://www.ahep.com.cn>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合肥远东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125

字 数:267 000

版 次:2002年5月第1版 2002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 000

定 价:17.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0551)2651321

邮 编:230061

出版者言

“海棠文丛”是一套中国文学研究丛书。丛书分一、二两辑，第一辑为古代文学研究；第二辑为现当代文学研究。

第一辑初收四种：陈道贵博士的《东晋诗歌论稿》、吴怀东博士的《杜甫与六朝诗歌关系研究》、朱文曙教授、博士的《明代戏曲评点研究》、胡益民教授、博士的《张岱研究》。这四种书都是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在出版前吸收了评审、答辩老师的意见加以完善提高，并加入博士毕业后一段时间的科研新成果。

第二辑初收五种：王宗发教授的《当代文学观察》、张器友教授的《现当代文学思潮散论》、王达敏教授的《理论与批评一体化》、吴家荣教授的《阿英传论》、张鲁高博士的《先驱者的痛苦——鲁迅精神论析》。这四位教授都出过多种专著，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颇有建树，这次收入丛书的著作是他们新时期以来研究的精华所在。

应该说，收入文丛的九种书都是十分严肃、规范的学术著作，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都有所突破，代表作者本人及当前文学研究的学术新进展。

“一从梅粉褪残妆，才抹新红上海棠。”学术园地百花齐放，梅花报春，海棠斗艳。丛书之所以取名“海棠”，正是寄寓这套丛书是我们学术春天的一抹新红，装点此江山之意。

作为一套丛书,在版式、体例上力争保持统一,但在少数地方,考虑到研究对象的特殊性 & 研究者的个性,并不强求一致,以免削足适履,在此一并交待。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 年 5 月

序 一

章培恒

晚明作家群离开我们至少已在三百年以上了，但有些还活在今天的若干文化人心中。台湾女作家龙应台在其散文《苏州的读者》里就曾说过：“虎丘为什么一定得去呢？不是因为吴王阖闾葬在那里，下葬三天，有白虎蹲踞其上；不是因为梁高僧竺道生曾在千人石上讲道。我不能不去虎丘，是因为两个前辈曾经用最美丽的中国文字对我描述虎丘的中秋夜晚。／袁宏道说，平常‘凡月之夜，花之晨，雪之夕’，虎丘已游人如织，到中秋，苏州人倾城而出，从‘衣冠士女’到葑屋贫户，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席子毯子和美酒，从千人石上至山门，铺排开来，‘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然后，一个显然未经过组织，完全自动自发的音乐演唱会就开始了……上千的听者，凝神倾听。夜更深时，只剩‘一箫，一寸管，一人缓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魂销’。到最后‘月影横斜，荇藻凌乱’时，整个虎丘‘一夫登场，四座屏息，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矣’。

比袁宏道晚三十年的张岱在多年之后也盘坐千人石上，倾听三鼓，看见‘一夫登场，高坐石上，不箫不拍，声出如丝，裂石穿云……听者寻入针芥，心血为枯，不敢击节，惟有点头’。”

在该文将近结束时，她又说：

“要离开虎丘，才知道我到虎丘其实不为看风景古迹，而为了看一个文化，一个美感充沛的文化。在一个月光灿亮的夜晚，苏州人不约而同来到山头赏月品酒听曲。有那么多民间音乐家即席演唱，而‘听者方辨句字，藻鉴随之’，人人都是有点儿素养的评鉴家。当最精湛纯熟的歌者吐音时，千人石上肃静无声，听者神驰，只能默默点

头或者慨然泪下，歌声余音在明月山风里袅袅不绝。这是艺术欣赏至高的境界。张岱忍不住叹息：‘使非苏州，焉讨识者？’”

她所引述的晚明时期虎丘中秋之夜的情景确实很美，可惜的是正如她在该文中慨叹的，这种美在今天的虎丘已经荡然无存了。幸而袁宏道和张岱的文章还在，它们也就继续活在一些人的心中，连同着袁宏道、张岱当时对此的感受。而由于他们所写的作品远远不止这一篇，他们也就时时通过作品而与读者进行着感情的交流，使人们体味到欢喜、悲哀、美和无常。

这两个作家之所以在逝去这么多年以后还能与今天的人心灵相通，除了他们所处的社会已为个性的发展提供了不少相对有利的条件以外，其作品之敢于和能于显现个性是更其重要的原因。前者是由于其不惮袒露心扉，后者则由于其在写作上的打破成规，自出机杼——不但为前、后七子所束缚，也不为唐宋八大家之类的古文所桎梏，即使对于八大家中成就最突出的苏轼，袁宏道之弟中道也勇敢地说：“今东坡之可爱者，多其小文小说，其高文大册，人固不深爱也。”这其实也是袁宏道、张岱诸人的心声，他们走的都不是苏轼高文大册的一路。到了上世纪的20年代，周作人把以袁宏道等为代表的晚明文学作为五四新文学的滥觞，也就是从晚明文学的此种特色着眼的。

也正因此，袁宏道、张岱诸人不仅今天仍以其作品润沃着人们的心灵，而且在中国文学史上更具有承先启后的重要地位，实在是很值得、也很应该加以研究的作家。不过，从上世纪的40年代开始，晚明文学就在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受到了冷遇乃至批判，到80年代，其价值才又逐渐被承认，但研究成果仍然不多。袁宏道还较幸运一些，出版了钱伯城先生的《袁宏道集笺校》和另一些论著，张岱则连诗文集也尚未全部重印，研究起来障碍重重，要对他做较具体、全面的描述和较确切的评价自也殊非易事。

然而，尽管是在这样的条件下，胡益民同志仍然克服种种困难，较充分地掌握了有关原始材料，并在此基础上写成《张岱研究》。我想，这对于张岱研究将起到很有益的推动和深化作用；我更希望以此为契机，能有一部整理较好、校印认真的张岱全集出版，使张岱的真实价值能逐步为今天更多的读者所认识。

序 二

骆玉明

张岱的名字，一般稍涉中国文史的人都觉得很熟悉，但要详细说起来，却又难免觉得所知甚少。说熟悉，是因为自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诸人彰扬晚明小品以来，他的《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二书广为流布，且至80年代再度成为阅读热点，新出的版本据说有十数种之多；说所知甚少，是因为张岱于明亡后隐迹不出，生活潦倒，甚至沦为无籍之民，他的大量著作虽幸免于水火，却长期封藏于深阁，极少有人接触，故其晚年行事恍如隔雾，诸多疑点无从辨明。于是人们只能凭借着在其全部著作中只占很小一部分、且有些内容曾经传钞者妄改的诗文来谈论他。当然也有研究者试图通过各种线索尽可能深入地考察张岱，但受资料限制，要做得透彻终究是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读到的这部《张岱研究》，是胡益民先生的博士学位论文。它是以张岱全部尚存于世间的保存了原始面貌的著作为基础写成的，这在学术界还是第一次。我们看作者所使用的资料，像《张子文秕》、《张子诗秕》、《琅嬛文集》（诗集部分）、《石匱书》、《石匱书后集》、《瑄朗乞巧录》等等，都是非常珍贵的手稿本、原钞本或配钞本；长期以来，这些本子或分散在各大图书馆的书库中，未经系统调查；或在私人藏书家手中，外人难以知晓，于是成了一种虽存而似亡的情形。作者历时十年得以掌握了这些珍贵资料，固然有赖于近些年来学术氛围的改善，但个人所付出的辛劳也是可想而知的。

资料的真实与完整对于研究工作的重要意义本不待言。举一例来说，以前的研究者或据传世的普通钞本来讨论张岱诗中的反清思想，但如胡益民指出，对照张岱手稿本，可以发现那类普通钞本不仅已经删去了不少明显的反清内容，还时常出现妄增的“我大清”字样。

这对研究者所要达到目标,无疑是巨大的阻梗。文字著述于明亡之后的张岱而言,是穷困和耻辱的人生仍能保有其延续之价值的精神支柱,是他的智慧、意志、情感的凝聚形态。今天这些著述久晦而复显,实是张岱之幸。

由于上述原因,这部《张岱研究》的面貌与已有的同类论著显出极大的不同。在本书中,关于张岱诗文的成就几乎没怎么涉及;它的分作两大部分的主要内容,一是关于张岱之家世、生平、交游、著述等基本情况的考察,一是关于其社会一哲学思想、文艺一美学思想及史学成就的论述。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在前一方面人们已经谈论得很多,不再有多少新鲜话可说——实际上作者对此是有重新研究的打算的^①,而是因为在本书所涉及的方面,过去由于资料的限制,存在许多空白和不确切的认识,亟待加以填补和澄清。我们现在看到的张岱,不再只是一位似乎是飘浮于人世的“性灵”气的散文家;他有着不寻常的经历和奇特的性格,虽标榜洒脱却又潜心学术文化的创造,在文学之外的诸多领域内都有着不可忽视的贡献。作为读者,我们通过胡益民先生所做的工作,得以理解这位于明清易代之际在许多方面的均具有代表性的文士的丰富的精神生活,也不能不说是一件可庆幸之事。

说及明清易代之际,那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诚然,在此之前的中国的王朝早已屡经更迭,外族的所谓“入主中原”亦出现过多次。但在经历过晚明思想解放浪潮之后,那一时代中深于思考而又高度敏感的文人们由这一场历史巨变所感受到的精神压力,是远远超过其前人的。民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社会不同阶层的利益冲突,个人仅作为个人而存在的权利与个人作为某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而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之间的矛盾,这些都同时纠缠成一团。在这样的时代里,人应该如何生存,如何认识历史与现实,如何在忍辱负重的生活中保持个人的尊严乃至高雅的趣味,都是不容易应对的难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艰困的境遇实也是对人格与思想的淬炼。张岱是一位江南名士,富

① 益民附注:原论散文的第四章当时博士论文答辩时因篇幅过长未置入,拟修改扩充后单行,因时间紧迫现仍照原样收入,歉甚。

于才情和学养，坚韧而不乏机智，他的人生选择和对历史与现实的思考，不仅反映了那一特殊时代的社会氛围，体现着一个读书人在强大的压力中对人生真谛的追寻，同时也标志了由士大夫所承担的传统文化的自我变异与更新。过去人们只是把张岱的散文与现代散文联系起来看，实际上，对于探讨在受西方文化冲击之前中国文化本身所蕴含的朝着现代方向变动的内在趋势，以及这一种变动所面临的问题。张岱在众多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想，本书的出版，对于推动关于张岱乃至明清之际文化的全面研究，会产生它应有的作用吧。

我同胡益民先生相识的时间并不太长，在一次纪念吴敬梓诞辰的学术会议上，才有缘相识，同时读了他与周月亮先生共著的《〈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一书。令我感动的是他的文笔因感慨于专制制度对人性的奴化，感慨于中国读书人、知识分子之历史命运而洋溢的激情。现我们读到的这部《张岱研究》，虽以资料的发掘与考证最为引人注目，但在评述部分，也同样是富于激情且有力度的。作为学术研究，对所涉对象好恶过深，或许难免会影响到考虑问题的周全和分析的精细，但由此也呈现出一种个性色彩。也是由于性情相近的关系，我同胡益民先生颇有一见如故之感。感念于他和出版单位信赖，遂写了这样一篇像是读书心得的文字。

目 录

序 一	章培恒(1)
序 二	骆玉明(3)
导 言	(1)

上 编

第一章 社会—哲学思想	(8)
第一节 对程朱理学及八股科举制度的理性 主义批判[8]	
第二节 辩证法思想[15]	
第三节 “心本体”问题与张岱哲学的美学化 倾向[19]	
第二章 文艺—美学思想	(24)
第一节 诗画界限论[24]	
第二节 艺术范畴论[28]	
第三节 艺术家论[37]	
第四节 文学批评标准论[49]	
第五节 戏曲理论[55]	

第三章 史学的贡献与成就 (60)

第一节 史著概评[60]

第二节 治史原则和历史观[70]

第三节 “《九章》《哀郢》之辞”[83]

第四章 散文创作及成就 (89)

第一节 概说[89]

第二节 题材的革新与拓展[91]

第三节 史传散文[101]

第四节 人对自然的审美解悟[106]

第五节 同代人物小品[112]

第六节 张岱散文的文化学蕴涵[117]

下 编

第五章 家世生平考索 (120)

第一节 家世[120]

第二节 生平[130]

第六章 交游考论 (172)

第七章 著述考略 (202)

**第八章 张岱卒年及《明史纪事本末》作者
问题考辨** (226)

第一节 张岱卒年考辨[226]

第二节 《明史纪事本末》作者问题考辨[230]

附录一 编年事辑 (234)

附录二 张岱明代文学史论(辑校)	(262)
附录三 《康熙会稽县志·凡例》辑校	(269)
主要参考文献	(271)

导 言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忠臣义上，多见于国破家亡之际，如敲石出火，一闪即灭”（张岱《张子文秕·越绝诗小序》）。易代“之际”，中国历史发展中一个最令人颤栗，令人颊赤耳热，眦裂发指，同时也令人感奋向上，令人寻味无穷的话题。殷周之际、周秦之际、汉魏之际、隋唐之际、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清末民初之际……中国历史上已出现过许许多多“之际”。纵观历史，在“之际”中，虽不免总有沉渣之泛起，败类之显相，但大浪淘沙，“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鲁迅先生《“题未定”草（九）》）；每在这“之际”中，仁人志士临难不苟，慷慨赴死，他们的碧血长弘，光耀日月；他们的忠贞之气和嶙峋傲骨支撑了社会的人格坐标，使民族凝聚力终赖以不堕，中华民族在一次次“之际”的磨难中艰难而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得以壮大发展；更有大批杰出的学者、思想家，每于国破家亡之际，直面现实人生，沉痛地反思历史，思想智慧以此得到空前的发挥。审视一下中国文化史，中国学术思想，甚至文学艺术最辉煌的时代亦多见于艰难而悲壮的“之际”。这是一个无可奈何的二律背反，亦即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产力发展与意识形态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

正出于上述对国破家亡之际志士仁人爱国忧民伟岸人格的钦敬和对“之际”时期学术思想、文化繁荣原因和所臻高度的认同，笔者选择了明清之际性格奇特的抗清志士、学者、思想家、艺术理论家兼作家张岱（字宗子，号陶庵，1597～1680）进行个案研究，并试图通过这一个案研究冀能对明清之际的学术文化全貌有一总体了解，以为今后进一步的综合研究打下坚实基础。

本文之所以在明清之际的抗清志士兼学者一思想家中特地选择张岱为研究对象，除上述对“之际”之学的浓厚兴趣而外，具体说来，还出于以下原因：

其一,张岱奇特的人生经历和文化使命感深深吸引了我。他“少为纨绔子弟”(见《张子文秕·自为墓志铭》),中年开始沉潜学术;清军南下,“年至五十,国破家亡”(同上);鲁王政权建立,积极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乃避迹深山,在企望中兴中默默地隐居著述。于地老天荒之际,在“米炊不继”、沦为编氓,年近七十还自己臼米、担粪的至为艰苦的条件下,以令人惊叹不置的毅力先后完成了体大思精的史学巨著《石匱书》、《石匱书后集》及《史阙》、《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四书〉遇》、《明〈易〉》、《〈大易〉用》、《张子诗秕》、《张子文秕》等等,为后世留下了一笔至为丰厚的文化遗产。那种艰苦卓绝、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特别是那种坚持“国亡,史不可亡”的自觉的文化使命感、承荷感和“创造实绩”,实令人钦敬无任。而这一点,对今天反对民族虚无主义,提倡实干精神,提高民族自信心,亦有其借鉴意义。

其二,江、浙向为人文渊薮,而相对而言,浙东(广义的)又更具地域文化特色。这种特色的主要体现,一为卧薪尝胆式的韧性和雪仇精神:“吾越为报仇雪恨之乡,非藏污纳垢之地。”(王思任语)——自越王勾践至王思任、祁彪佳以至近现代的秋瑾、章太炎,内在精神气质上都有某种相一贯的因素;一为清醒的历史理性主义精神,这一点以王充、张岱等人最富代表性。“民族魂”鲁迅先生则是兼具二者而得其精华的杰出代表:他是集长于韧性反抗与历史理性精神于一身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是中国第一位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其受近代日、德及东、北欧诸国先进思想的影响至深,但同时,以张岱等人为代表的乡先贤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鲁迅全集》中提到其人其书即达九处之多,他还亲手补绘过《有明于越三不朽图赞》,足见张岱在鲁迅先生心目中的印象之深。本文反复彰显的张岱的韧性反抗精神和文化使命感、清醒的历史理性精神以及为文的那分厚重而含蓄内敛的高档次幽默感,鲁迅固然大大超越、发展了张岱,有了全新的时代内容,但受其影响的脉络还是颇为明显的。近年的鲁迅研究在对日本文化、德国文化(特别是尼采)于其影响方面的研究甚多也甚细致深入,但对山阴文化本身对鲁迅先生影响的研究方面却几乎还是一个空白。本文之选择张岱为研究对象,这也是重要的动因之一(拟为以后想重点探索一下以章太炎及前期鲁迅为代表的清末民族“之际”的学术文化思想打下一点材料基础)。

其三,浙东为甲申乙酉之际(1644~1645)江南反清复明运动的主要中心之一,这个时期领导或参加抵抗运动的文人、学者、艺术家,人数甚夥,除张岱外,另有钱肃乐、刘宗周、祁彪佳、陈函辉、陈洪绶、黄宗羲……等一大批知名人物。本文之所以独选张岱,除了他经历特殊(为遗民;但遗民中黄宗羲等人尚没有像他那样沦为编氓,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还考虑到他是兼历史学家、哲学家、杰出文艺理论家和散文家于一身的人物,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和艺术理论诸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贡献,更由于他因特殊人生的经历,所交者三教九流,能将古典式贵族“雅文化”与民间“俗文化”天才极致地融于一体,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自明中叶兴起而反复受挫的新文化走向,因而也更具有代表性。

本文的意义也由以上所述而得到彰显:

像张岱这样一位本应在中国史学史、文艺理论批评史乃至哲学史上都占一席之地的重要人物,过去因受材料的限制,特别是其煌煌巨著《石匱书》(钞本凡52册)及《史阙》、《〈四书〉遇》等长期以来密锁深藏,鲜为人知(连以搜罗书目广博著称的《剑桥中国明代史》在“书目文献”一章中也只字未提及张岱的史学著作),他作为著名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的地位一直被湮没(笔者所见到的文学批评史著作中仅上海古籍出版社袁震宇、刘明今著《明代文学批评史》中提及“戏曲批评”),一般仅在《中国文学史》中作为“明末小品文作家”略微提及,为人知晓。本文从挖掘第一手材料入手,旨在填补这一学术空白。“家世生平(含交游)考索”、“哲学-社会思想”、“文艺-美学思想”、“史学的成就与贡献”诸章,为本文难点所在,亦系重点所在。

张岱以史学家名世是在他生前。此首见于崇祯刻本《古今义烈传》卷首刘荣嗣、刘光斗、陈继儒、祁彪佳诸人所作序言。此书刻于明亡以前,基本上首尾完整。诸序均一致高度评价张岱的史才、史识,特别是其“统腐《史》《说》成一家之言”^①的语言风格。至于其明代纪传体通史《石匱书》及其《后集》,今所见最早评论材料,一为王雨谦

① 详本文第三章《史学的成就与贡献》第一节。

《张宗子诗叙》(写于1660年),特地提及:“然〔三〕十年苦思,《石匱书》告成,特与《史记》并有古今。即俾宗子不作诗,《石匱书》中未尝无诗也。”认为二者都是“发愤而作”的典范。^①一为毛奇龄《与张岱乞藏史书》,略云:“今吾乡志成,渐若晨星,而一代文献如先生者,犹幸得履修容,享耆龄,护此石钮。……〔兹〕不揣鄙陋,欲恳先生门下,慨发所著〔《石匱书》〕,汇付姜京兆宅,钞录寄〔明史〕馆,以成史书。”^②此信写于1678年,系代表异族统治的新王朝官方(明史馆)而作,且请张岱“将本朝(清朝)称谓一易”(同上),被誓死不事新朝的张岱断然拒绝了,然从此信亦可看出当时张岱作为知名史学家及《石匱书》声誉之大。但由于清统文化高压政策,张岱将此书自方郑思肖之《铁函心史》,秘不示人,以致离其时代不太远的同邑史学家邵廷采及作《南疆逸史》的温睿临,两人在所作简短的张岱传记里,已弄不清其书的具体内容和其人行迹了(详本文第七章第二节)。直到三百多年后,谢国桢先生才首次在《增订晚明史籍考》里著录介绍了此书,并钞录了作者自序。笔者亦迟至1990年才复印到此书的凤嬉堂原钞本和上图配钞本。故对张岱史学,特别是《石匱书》的研究,前此基本上尚付阙如,80年代末所出的两篇谈张岱史学或《石匱书》的文章,所据均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版《石匱书后集》,作者实际上并未见过《石匱书》乃至《史阙》,不赘。

对张岱散文的研究则一直是热门课题。

述及对张岱散文的评论,首先要提及鲁迅先生。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老牌京派”题签、新出道的“海派”标点的《琅嬛文集》的出版,极富文化厚重感的张岱却居然以“性灵派大师”的面目大大热闹了一阵。睿智过人的鲁迅先生,从纠正那并没有“化峭僻为康庄”的标点错误入手,对于文学批评上“只看一面,不及其余”地“肢解古人”,以及无性灵地“赋得性灵”等等弊端作了透骨入髓的批评^③。现在回过头来看鲁迅先生的一系列论断,在敬佩他那为一般奢谈“文化

① 国家图书馆藏《张子诗批》卷首序一,页二a~b。

② 见康熙刻本《西河全集·书》卷四,页十三a。

③ 参见《鲁迅全集》第六卷《“题未定”草(六、七)》,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423、425、427页。